

12500/21

文史资料选辑

——建国后史料专辑——

第一百二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青年自述

在特殊类型外交据点里

——回忆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工作 ……… 林 平(1)

在智利设点最为合适——贝德雷加尔先生带来智利的愿望——中央决定派我任代表——在美国“后院”创建特殊类型外交据点——登上拉美大陆——与国内联系的渠道与方法——学做生意——“一张桌子四条腿”——敌人伪造我国庆招待会请帖——用暗语报告北京外交部——阿连德总统授予我奥希金斯勋章

我的漫画生涯 …………… 李滨声(13)

新生活——良师——探索——讽刺的功能——亦赞亦颂——“列席”——《没嘴的人》——蒙混过关——暂时下放——状元府——特殊婚礼——到生活中去——画牛——“水中猪肉”——“三七开”——我还叫李滨声得了——“柏水翼章”——从文工队到南口农场——少小离家的辛大明——车轮战士——大字报的喜剧——南宁来信——答洋记者问——“机关泡”——《美的心

愿》——画像——金猴奖——后记

新中国第一

中国固体火箭发动机诞生历程…… 杨南生 崔国良(57)

早期的探索研究——300 发动机研制——770 发

动机研制——大型发动机研制

柴达木盆地第一个油田及特大型液体锂矿床

的发现经过…… 朱新德(71)

柴达木盆地第一个石油矿床的发现——柴达木盆

地特大型液体锂矿床发现经过

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战线的第一面红旗 …… 李俊九(77)

对私营企业改造的第一个航标

——忆民生轮船公司的公私合营…… 刘惠农(86)

民生公司与公私合营建议的提出——民生公司公

私合营的经过——向毛泽东同志汇报

新中国第一座华侨、港澳同胞投资兴建的饭店

…… 谢立东(95)

我国第一座 10 万吨级矿石码头的形成及开发

…… 邵尧定 叶信虎(99)

港址的选择——生存之争——江海联运

农业变迁

回忆“穷棒子社”…… 王国藩(108)

靠“三条驴腿”办起农业社——立有凌云志 摘

下星星来——全村合作化的前后	
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回顾	(146)
责任田的由来——责任田的推行——责任田的 “改正”	

民族家园

确定与恢复土家族民族成份的前前后后	田荆贵(170)
-------------------------	----------

最先提出“土家”是单一的少数民族——中南局的正确决定未得顺利实行——中央的调查结果亦被否定——土家人民的强烈要求与专家们的研究结论——中央的最后决定——两种区域自治形式的大讨论——省访问团深入湘西土家族地区进行访问——省政府召开会议协商决定“联合”自治的有关问题——组建“联合”自治筹委会开展各项筹备工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告成立——历史的曲折——民族工作进入了新的春天——国家民委全面考察湘鄂川黔边境民族工作——在京座谈恢复部分土家族成份问题——全面开展恢复部分群众土家族成份的工作——土家族普遍实现区域自治

果洛解放与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经过

..... 马万里(198)

封闭神秘的果洛——组建中共果洛工委和果洛工作团的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站稳脚跟——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

鉴往知今

葛洲坝工程的移民动迁和安置…………… 黄永贵(211)

移民概说——移民前奏——外迁枝江——就地后
靠——生产恢复——两岸受益

耆年自述

在特殊类型外交据点里

——回忆驻智利商务代表处的工作

林 平

作者 1938 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调外交部工作。先后任外交部美澳司专员、副司长，曾以王炳南大使助手的身份参加了中美大使级会谈。1965 年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智利商务代表处代表。1971 年任我国驻智利首任大使。后任外交部美大司司长，1978 年任我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1952 年 10 月，前来北京参加亚太地区和平会议的智利代表达麦斯蒂同我进出口公司签订了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同拉美国家间第一个贸易协定，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他在会见达麦斯蒂时表示，为加强贸易关系，“中国可能在智利设立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智利也可在中国设立同样的机构”。当达麦斯蒂谈到智利当选总统伊巴涅斯愿同我国建立外交及贸易关系时，周总理表示，中国也有同样的愿望，并阐明了我国的建交原则。周总理请达麦斯蒂转告当选总统，中智双方都在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是相互同情的，两国关系不但应该而且可能在最短期间建立起来。虽然由于智方的原因两国当时未能建交，但周总理的谈话对以后中智关系的逐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智利设点最为合适

周恩来总理制订的方针与原则，不仅针对智利，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与拉美各国的准绳。外交部美澳司曾考虑选择哪一个国家设立机构较合适，可能性大些。1951年以来智利来访的有作家、议员，以及文化、新闻、工会、青年、各党派等社会各界人士。1952年10月间，智利中国文化协会在圣地亚哥成立，中国和智利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中国也派出相应的代表团与各方人士访问智利。我们认为在智利设立一个机构的可能性较大。同时，智利政府是典型的议会民主政权，有与我国发展关系的愿望。如果我国提出以公司名义设立一机构，智利政府比较容易接受，对我们来说只要有一个机构存在，便会有利于与拉美人民及其国家的接触，既是需要也很重要。

贝德雷加尔先生带来智利的愿望

1959年6月智利前副总统、前内政部长吉勒摩·德尔·贝德雷加尔先生与夫人，应我国外交学会邀请，来华作私人友好访问。来华前智利总统亚历山德里托他到中国看看建立中智贸易的可能性。他带来了智利硝磺公司的一份备忘录，准备同外贸部陈明局长商谈。贝在宴会致词中正式表示：“我到中国来访问是希望尽快建立对我们两国都非常重要的贸易关系。”他还表示，这次访华主要是谈贸易，旅行是次要的。有人说同社会主义国家做不成买卖，我要证明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是可能的。在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冀朝鼎接见时，他都提出希望我国购买智利铜条、硝石的要求，最后与我进出口公司签订了硝石和茶叶易货合同和备忘录，以推动中智两国贸易的发展。

中央决定派我任代表

1961年10月，中国进出口公司在智利圣地亚哥设立商业新闻办公室，负责人是李言年同志。因商业新闻办公室是进出口公司下的机构，职能与影响较小，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为此国内指示李言年，设法寻机将办公室升级。李言年同志便写信给智利外交部长，申请建立一个隶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大约有五个工作人员的机构。1964年11月30日，李言年来信告知，智外交部副部长最近谈到关于和我国的关系时向记者表示：“现在还看不出和共产党中国建交，会给智利带来明显利益。”但又私下透露，智利政府有兴趣发展和中国的贸易，并表示可以接受中国方面在智利设立一个正式的商务机构。

1964年12月27日，李言年来电告，智政府已同意李言年的申请，同意设商务机构，工作人员四名。

国务院外办收到智利外交部经济司司长答复李言年的正式信件后，便报告了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外办提出：“在智利设立代表处，对进一步开展对智利的工作是有利的，建议由外交部派出代表处正代表，外贸部派出副代表。”这是我国在南美的第一个半官方机构，除进行贸易外，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因我长期管理拉美方面的事务，了解情况较多，外办提名由我担任代表，外贸部决定由具有丰富外贸经验的刘长恒同志任副代表。外交部为我们选派了西班牙文水平较高的黄志良同志任翻译，还派了一位烹调技术一流的厨司。因夫人不占名额，刘长恒的爱人张萍、黄志良的爱人刘静言（有较好的西班牙文水平）也被派往商代处工作，我爱人季尼因手术后需休息，缓期赴智。

在美国“后院”创建特殊类型外交据点

由外交部起草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智利共和国商务代表处工作方案》，经外办审核转呈毛主席、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周恩来总理在送批稿上批示：在智利设立贸促会代表处方面，必须注意各项手续，不要草率大意，人选方面，也要慎重选择，宁缺勿滥。

方案最后是关于政治思想工作，具体指出：“代表处远隔重洋，同国内联系困难，人员较少，不同于使馆是个单独作战据点。代表处要创造这种特殊类型外交据点工作的经验，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经常的和适应于当时情况的组织生活。注意发扬民主，贯彻集体领导和增进团结，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注意保密、保卫和安全工作，使代表处成为学习好、团结好、安全好和工作作风好的战斗据点。”

反复阅读中央的方案，要在美国的“后院”创造特殊类型外交据点工作经验，深感担子不轻。我们没有使馆工作的各种方便条件，却有使馆遇不到的困难与复杂情况。但也想到有利的方面，那就是工作的约束力没有使馆那么大，贸易商务人员身份可以更广泛的接触各界人士。

登上拉美大陆

1965年4月初，我与刘长恒同志等六人，带了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给智利外交部和智中文协的介绍信，乘民航离开北京，到上海转乘法航到达巴黎，受到驻法大使黄镇同志的热情接待。因商务处是民间机构，智方不准我设通讯设施，不容许信使出入，为此一到巴黎，第一件大事就是选购一架性能良好的收音机，这样可以每天收听到国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使

我们及时了解国内国际情况，重要社论成了指导我们工作的文件。

4月9日，我们到达圣地亚哥机场，前来迎接的有智利各界、各党派人士、如议员，作家，记协成员，激进党、社会党领导人等。朋友们向我、张萍、刘静言三人献上美丽的鲜花，使我们一踏上智利的土地便感到了温暖。其中最难忘的是安娜律师、阿尔梅达先生，他们始终对中国真诚友好。李言年同志把我们带到驻地，从此开始了我在智利的工作与生活。

在贝德雷加尔先生陪同下，我、刘长恒、李言年、黄知农四人拜会了智利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经济司司长，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进出智利外交部大门，均遇到记者采访和照相，记者向我提问：“你们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中智发展贸易的可能性如何？”等等。记者提的是正常的、一般性问题，态度也很友好，我一一作了回答。第二天，我们拜会的情况被登在圣地亚哥报纸上。实际上等于宣布了中国在智利商代处的成立，宣布了这个机构是智利政府同意的；同时，也公布了商代处的机构与任务。接着，又拜访了智中友协主席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大家动手、齐心合作下，1965年6月10日，我们举行招待会，正式宣布我驻智利商务代表处成立。出席我招待会的有各界的朋友，场面很热闹。商务代表处的成立在智利受到各界的重视，也引起拉美各国的注意，停居在巴西的台湾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了拉美大陆。

与国内联系的渠道与方法

智利圣地亚哥与中国北京远隔重洋，时差整12小时。有利的是，北京早晨8点正是圣地亚哥晚上8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国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但这只解决一部分困难。报纸、信件等，在没有外交信使进出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国际邮政，我们在圣地亚哥市邮局里租用一只信箱，这也算是与国内联系的

一条公开渠道。虽然每次我们看到的报纸都是国内半个月或 20 天前出版的，但每个人都认真地细读，看作是中央文件、重要指示。家信更不用说了，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人都渴望收到一封家书，以使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个中滋味，没有在这种环境里生活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代表处的同志对去邮局取邮件是最自觉、主动了，不用安排。智利邮局有时扣压邮件，有时对我们刁难，但我们都能顺利地应付下来。

到智利 40 天后，我们写了一个关于智利情况与今后形势估计的报告，托人带给我驻捷克大使仲曦东同志转交外交部。我想只有将有关情况写成文，拍成胶卷，然后带出去。如何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我们买了一架 135 型的西德产莱卡相机，在桌子上将相机用架子撑起，四角放上办公用的台灯，文件放在适中的位置，调好距离拍摄。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并且还学会了冲洗胶卷、放大相片。这些胶卷被带回国内，听专业人员说，冲洗出来的胶卷非常清晰。以后从巴黎给我们转来的有关文件、中央指示，也是拍成胶卷的。这样与国内联系的困难解决了。

与国内联系的另一渠道是明码电报，其内容是做生意，但有时是双关语，真真假假，国内有关部门是懂得代表什么内容的。

学 做 生 意

我是外交官，但现在是商务代表。为了符合我的身份，还有工作上的需要，有关贸易业务虽然是刘长恒同志主管，我也得慢慢地熟悉与学会这些。我与铜公司谈进口智利铜；与硝矿公司谈进口智利硝；与纸浆公司谈进口纸浆；又与农产品公司洽谈我国向智利出口大米、茶叶等。与梅耶纺织厂接触，了解我国与智利在纺织品进出口方面的可能性，借此认识了一批中小商人，还有代理商。每拜访一个公司，我总是像推销员一样，身边带着样品，像做生意的样子。

通过这些活动，使我了解了什么是电解铜，最好的含铜量是99.96%。我国希望直接向智利购买铜，智利铜公司坚决不答应，坚持通过伦敦市场交易所，目的是可以获取高价。由此每天要了解伦敦铜市场价格的变化，尽可能不让国家吃亏。经过多方努力，曾与智利铜公司签订了每年进口1万吨的协议，价格仍然是伦敦市场牌价。因智利人民爱喝中国红茶，花茶也有一定的吸引力，通过代理商智方曾进口我一部分茶叶。上海出产的钻石牌闹钟与瑞士产品相比价廉物美，也引起智利商人的兴趣。我国的轻工业产品等有少量进入智利市场。

在商务活动中，我学会了国际贸易市场专业用语和有关业务知识。1966年6月，国内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刘长恒副代表回国参加“革命”，外贸业务全部由我承担，从此我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商务代表，直到中智建交。

“一张桌子四条腿”

智利与祖国远隔重洋，国内正在进行的那场“浩劫”也波及到这里。刘长恒夫妇回国了，外贸部派杨子仪同志前来接替，担任外贸翻译。黄志良夫妇调回了，由黄士康同志来担任政治翻译，季尼同志因病回国了，厨司也轮换回北京，原有商代处的成员是我与两名翻译，一名厨司，共计四人，成了“一张桌子四条腿”。我常说，虽然是“一张桌子四条腿”，但还是幸运的，留下了我这个代表，没有像其他使馆的大使、参赞那样被勒令揪回。其实当时造反派已贴出大字报，要将我揪回批斗，接替我的人选亦已商定，乔冠华同志顶住了这股恶浪，考虑到一旦我被人揪回，便会失去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外交据点，政治损失太大了。

商务代表处人员发生了变化，但任务没有变，这副重担落到四个人身上，当然，我肩上的分量更重了。我首先考虑的是，四个人要团结如一人，以“一张桌子四条腿”来形容面临的实际情

况，缺了谁也不行。有很短一段时间，因受国内极左思潮的影响，把小红书当宝书，搞早请示晚汇报。后来觉得实在没有意思，经过大家讨论便停止了。排除了这些思想障碍与负担，代表处照常放手做生意、交朋友。

有一次，为了解商人进口我商品情况，如衬衫、纺织品等，我与杨子仪同志前往智利自由港口彭塔阿雷纳斯市。从圣地亚哥乘飞机到蒙特港，再换乘长途汽车到达彭塔阿雷纳斯市。下车后找不到出租汽车，也不知道旅馆在哪里，一整天的旅途疲劳，两只箱子又放在脚边，实在举步难行，怎么办？我首先将箱子扛上肩膀，鼓励小杨也扛起箱子，一路走一路问，最后总算找到了旅馆，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应智利石油公司邀请，我与黄士康同志前往火地岛参观石油基地。我们从智利南部蒙特港乘该公司接送职工上下班的飞机到达石油基地招待所。这个基地是由美国 ESSO 石油公司提供技术开采的，所产石油是智利 60% 的消耗量。阿根廷则在岛的另一面开采石油，因为这个岛是两国共有的。这里的职工福利待遇异常优越，住房由公司提供，一家一幢别墅式的楼房，特别重视医疗保健，建有医院，设施齐全，医疗器械均自西德进口。一年四季为使工人下班后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得到休息，除建有健身房、游泳池、各类球场，还建了室内公园、室内日光浴室等等。当地警察局长听说中国商务代表来此参观，很友好地邀请我们参加招待会，我们便大胆接受邀请，不放弃交朋友的机会。

经常是这样，“两条腿”出外开会、活动，“两条腿”在家管理日常工作。在这期间，我还与杨子仪同志到过北方自由贸易区阿里卡，了解情况，寻找进口商品的客户。还到过北方伊基克采矿区，参观硝石的开采。激进党议员戈麦斯先生的弟弟，是进口我国蝴蝶牌缝纫机的代理人，我们了解了他的进口能力与在该地的影响，分析了他进一步与我进行贸易的可能性。这里有很多老华人，国民党在此有一定势力。我拜访了该地中华会馆，馆内挂

着国民党党旗、孙中山像等。

因为原聘请的智利女公务辞退了，厨司同时担任烧饭、招待员、打扫会客室的工作。财务管理由我与黄士良同志轮流负责。有一次国庆招待会，因工作头绪太多，一算账少了 100 余智利币埃斯库特，便由我抵付。花园与人行道浇水、打扫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平时宴请与小型招待会由我们四人承担；国庆招待会也由我们四人组织，加上热心华人的帮助，邀请客人人数与往年一样，还逐年有所增加。

我们这“一张桌子四条腿”，大家齐心协力，坚持了这个据点，使我国在智利的影晌不断扩大，主张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人士越来越多，贸易额虽然不是太大，却有所发展。

敌人伪造我国庆招待会请帖

1967 年国庆招待会请帖，经我们四人数日加班加点，已分头投递出去。9 月 26 日下午，有一素不相识的智利人给商代处打电话，他说与商代处素无往来，今年为何发给他参加我国庆招待会的请帖。经查对，我邀请名单中并无此人。为弄清情况，立即派黄士康去该人办公室看请帖，并将请帖拿回。经与我请帖对比，发现是伪造的，从而开始发现了假请帖。27 日上午从邮局信箱里又拿到 40 多份无法投递的假请帖，以后又陆续拿到一些，共计有 70 多份。同时，又前后接到了 30 多起收到假请帖人的电话。假请帖散发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政府各部门、各有关机构人员、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以及联合国驻智利组织机构等。散发数量很大，估计有 1000 份以上，超过我所发请帖的一倍多。

智利朋友的那张假请帖，给我们提供了敌人在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线索。但敌人究竟是谁？散发了多少假请帖？目的是什么？一时尚不清楚。为此，我们先后访问了万徒勒黑、一些访华友人、执政党议员等，通过这些接触和对假请帖进行分析，基本上可以

断定破坏是由国民党特务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我们招待会搞乱，在智利各界人士中造成对我不满，削弱我在智利人民中的影响，伺机挑起反华事端。为不使国民党特务阴谋得逞，决定招待会按期举行，并采取如下措施：

1. 向邀请出席招待会的智利朋友补发一封信，以代替原发请帖。这样一方面可以揭露敌人破坏的阴谋，一方面可以免除假请帖混淆。

2. 向智利外交部副部长报告这一情况，请他们对此事进行调查和对我活动予以保护。并请智中文协向内政部长和圣地亚哥省长报告了敌人破坏的事实，请他们对此引起注意。

3. 组织一些朋友在大门口检查请帖，防止持假请帖者混入，并做解释。

4. 通过报纸、电台公开揭露敌人伪造假请帖的事实，诚恳地忠告接到假请帖者不要上当。

5. 我们还与警察局联系, 请其给予协助, 加强警戒。过去客人车辆开到商代处门口下车, 现改在警戒线外下车, 警察严格检查, 持有通知信者才能放行。

6. 在内部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送来的祝贺花篮严格检查后才放进屋内，招待会一结束迅速予以处理；准备汽灯，以防断电；准备消防器材，以防火灾。

上述措施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破坏阴谋，保障了招待会顺利举行。出席的人数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共有500多位智利各界朋友，其中有副部长、参议院正副议长、众议院副议长、参众议员，还有国家银行总经理等各方人士。招待会气氛热烈、友好、亲切。我们得到了朋友们普遍的同情和支持，大家对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一致表示唾弃和谴责。很多朋友为了支持我们而早来迟退，还有些朋友为防止在招待会期间发生事情，自告奋勇地来帮助我们照

们中有许多人来电话询问，经我解释后表示谅解，不少人来信表示热烈祝贺，有人甚至给招待会送来了花篮。在招待会举行时，仍有几名智利朋友因不明真相持假请帖前来参加，经我礼貌地解释后，绝大部分表示：他们虽不能参加，但仍然是中国的朋友。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四人临阵不乱，沉着应付。获悉假请帖后，曾考虑是否取消这次招待会，研究结果一致主张照常举行。因取消反而使敌人达到目的，敌人成了胜利者，只有照常举行才能粉碎敌人的阴谋。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四人团结如一人，取得了胜利。

用暗语报告北京外交部

在智利大选时，1970年5月20日，阿连德曾向我表示：“我们掌握了政府后，两国关系要正常化。”9月20日，阿连德委托万徒勒黑告诉我，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发展贸易关系，这是他施政纲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定要实现。与此同时，阿尔梅达又向我表示，社会党组成政府后，第一件事就是考虑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征询在何处谈判较合适，要求提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公报等。我向其提出在法国巴黎谈判较合适，阿尔梅达欣然接受，对我提供的建交公报非常认真地作了研究。

获悉上述情况，我立即以明码电报报告北京外交部，使用暗语说：智利最近拟与我达成一笔铜的交易，请做好准备。阿尔梅达告我，拟在巴黎由两国大使正式谈判。我又向国内以明码电报报告：铜的谈判智利决定在巴黎进行，拟予以成交。国内得此电报后极为重视，外交部作了充分准备，两国驻巴黎大使谈判进展非常顺利。

阿连德总统授予我奥希金斯勋章

1971年1月15日，中智两国政府宣布正式建立大使级关系。

中智建交，就是商代处任务的结束，也是特殊外交据点任务的完成。这时我想，一是调我回北京，另行分配工作；二是继续留在智利。但后面的可能性不大，长期以来我们自认是民间商务机构，不可能一变而为外交机构，因此，一切都作了调回北京的准备。果然国内来了调令，委任丁浩同志为临时代办。接调令后，立即向很多老朋友辞行，在丁浩代办到任前举行告别招待会，朋友们都热情而又依依不舍地与我握手告别。1971年2月11日，智利外交部长阿尔梅达邀请我去他家，专门设宴给我送行。席间说了很多友好的话，并代表智利政府及阿连德总统授予我奥希金斯勋章一枚，表彰我为中智关系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得勋章，怎么办？为了接受阿连德总统友好的情意，在无法请示国内的情况下，我果断地接受了。我觉得拒绝是不对的，这不是单独对我个人如何，而是对我国人民和国家的肯定和赞誉。

离智前，丁浩代办带领建馆人员到达圣地亚哥。我与司机卡尔洛斯各驾一辆车，前往机场迎接他们。我为他们介绍情况，帮助他们安排妥当后，离开工作近五年之久的智利，完成了在智利建立特殊类型外交据点的任务。